

毛泽东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

彭援军

《人民日报》的前身最早是1937年12月11日创刊的《抗敌报》（晋察冀边区总军区军政委员会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更名《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1946年5月15日创刊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创刊的华北《人民日报》（华北中央局机关报）；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随党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后，还出版过《人民日报》（北平版）、《北平解放报》、《人民晚报》、《人民日报》（北平新闻）等副报。

在《人民日报》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用过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三种报头。



第一次《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全套红，1946年5月15日，刘伯承题词



《人民日报》，1946年8月1日，第75号，所刊报头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人民日报》题写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日的报纸

集字“人民日报”

1946年4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办一张机关报，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会议长的薄一波赴延安汇报工作，他受报社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拟写报名是《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毛泽东欣然应允，但指出：“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这个名字有没有人用过？”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创刊，题字还没有到，于是编辑部就自己动手应急，从各种毛泽东手书中集字而成“人民日报”4字。当时已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重要干部的李庄，走遍邯郸，也找不到会制作铅版的制版师傅，只好请人木刻制版，将毛泽东的集字做成由右向左的横幅报头，用在创刊号和随后的报纸上。

1946年5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创刊号第一版为全套红，左右报眼为：鸣谢启事和广告刊例。头版头条是《国民党当局破坏菏泽协议，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区，不顾七百万人民生命，图逞内战阴谋》；左部一长条是《发刊词》，《发刊词》标题上方还有装饰的木刻图案，是解放军战士策马飞奔形象。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为《人民日报》出版题词：“力争和平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乃人民呼声。”第一版上还刊有：《国民党军结合敌伪，高唱备战，大举调动，屡犯我边区，三个半月大小进攻九百余次》，《沁县阎军特务横行，殴打我联络组人员》，《我已向东沁线小组提出抗议》；《周徐白三氏飞南京》；《蒋介石飞新乡》；《何思源密谋进攻解放区，密运物资于聊城伪军，大批反共文件一并为我查

获》等消息。

第一次题写报头

一个半月后，毛泽东于6月间在延安题写了由左向右的横幅《人民日报》报头。当时，毛泽东一连写了五幅“人民日报”，写完后对身边的警卫员们说：“谁写得得好，也来写一张。”大家都说不会写。于是，毛泽东便请战士们说：“哪张写得得好，帮我挑一挑。”毛泽东第一次题写的人民日报报头字，由薄一波带到河北武安，编辑部美工再把这个亲笔题词木刻成新的报头，刊用在7月1日以后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

1946年8月1日星期四出版的第75号《人民日报》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该期报纸为对开二版，报眉上有汉语拼音“人民日报”字样。从报头下方可知报社相关信息：一是本报自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创刊；二是通信处为武安邮局转；三是价目，零售每份五元，预订每月90元，邮费本市不收，外埠每月2元；四是本报已呈请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备案，发给边区新字第一号新闻登记证；晋冀鲁豫边区邮政管理局登记认为新闻纸类发给登记证第六号。其中有关报社编辑部地址，当时战争状态，报社亦有军事保密性质，实际上编辑部是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指挥部相邻。

第二次题写报头

创办华北《人民日报》时，毛泽东于1948年5月27日从阜平县花山村来到平山西柏坡，为新创办的《人民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提笔挥毫，边写边说：“人民日报这四个字啊，中间两个字要小一点，两边两个字要大一点，这样就好看了！”毛泽东一连写了4行“人民日报”共16

字，交给薄一波转人民日报编辑部。题写的时间应在6月10日左右，最迟不会晚于6月12日。

1948年6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里庄创刊。时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报纸定价是每月边币3万元，冀钞3000元。创刊号所列通讯处为邯郸、石家庄、邢台邮局转。

报头两边报眼位置，刊登了重要启事，全文是：一、中共华北中央局决定，晋察冀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区人民日报实行合并，统一出版本报。本报受命于今日创刊。晋察冀日报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即日停刊。同时，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与晋冀鲁豫总分社也奉命合并为华北总分社，原晋察冀总分社今后统由华北总分社领导。二、原晋察冀日报及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订户均为本报订户，六、七月份仍按原订价寄发，不另加价。从八月起，改按新价订定（应在7月25日以前预订）。原晋察冀日报及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通讯员均为本报通讯员，希能继续源源供给稿件。三、本报创刊伊始，人力物力均未布置就绪，编辑发行诸多困难。发行脱漏现象恐在所难免（本报当尽量设法补救）。敬希党政军民各界多方指导帮助，以匡不逮，无任企感。

第三次题写报头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为此，毛泽东第三次挥笔题写《人民日报》报头，此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10月1日第四六八号《人民日报》是开国大典之日的报纸，这天是星期六，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

路易·艾黎在上海

本报记者 顾意亮

抗日战争时期，路易·艾黎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查尔斯是谁？

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西安事变后成为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是在隐蔽战线立下了功勋的统战功臣。

艾黎在上海恩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在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阙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住过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1935年的一天晚上，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带来一个人，她介绍

说是查尔斯，“他将在你们这暂住一段时间”。于是查尔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员，后来艾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处境窘迫，暂居艾黎家的这段时间给了他很好的休整时机，同时也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艾黎在消防处工作，配有公用车，这给了刘鼎等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人士很好的掩护。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你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国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吃紧。路易·艾黎担心家里来往客人多，刘鼎会引起注意，就将他送到宋庆龄在法租界住处。在此期间，刘鼎同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他的留学经历和在上海的工作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推荐他到东北军工作埋下了伏笔。

1936年3月初，史沫特莱受宋庆龄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刘鼎，告诉

他有位朋友约其在法租界内一家咖啡馆见面，有事商谈。这位朋友叫董健吾。原来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旧部，表示愿在西北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托旧部找到董健吾，并将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

在艾黎的安排帮助下，刘鼎见到了董健吾，一开始刘鼎心生疑虑，自己才刚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又要去抛头露面，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后经过仔细研究国际形势、东北军、红军在陕北的消息及张学良为人处世的特点后，决定接受邀请，路易·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

楼顶的秘密电台

与《红星照耀中国》

艾黎和同住的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为中共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住所底层设有一间小工房，为组织修理手枪之类的武器。他们又在家设置了秘密电台，与国内一些地方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络，发报机就装在顶楼。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情况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在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

系教授的两年间，斯诺努力学习中文，并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爱国革命人士，也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

斯诺来到中国的几年里，耳闻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心中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否真的如“南京政府”所说是“流寇”？既然是“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红军呢？随着疑问的加深，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到延安这块神秘之地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并公布于世，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然而要去延安采访，又谈何容易。从道路到通讯，各方面都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包围着。于是，斯诺决定于1936年4月赴上海向宋庆龄求助。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认识了在上海帮助地下党进行革命事业的路易·艾黎。两位国际友人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理想不谋而合，艾黎立即为斯诺提供了自己住处的秘密电台，把斯诺的想法通过秘密电台传达给陕北。

收到电台后，毛泽东作出决定，同意斯诺访问延安及对外界如实报道，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由此便开启了斯诺的“红色中国”之行。

此后，斯诺见到毛主席，了解到了真实的红色革命情况，并写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可以说，艾黎设立的秘密电台帮助打通了一条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红色革命的通道。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贾大山是河北正定人，曾任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一度与贾平凹齐名，被文学界誉为写短篇小说的“二贾”。

尽管贾大山还不到40岁就已成名，是当时河北省乃至全国的著名作家，然而，此后他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作品集。一个著名的作家，没有自己的一本书问世，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全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

1982年12月，贾大山担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将近10年的任期，贾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保护、维修、抢救，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当时，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正定隆兴寺由于年代久远，急需全面修复，为了筹措资金，贾大山奔走于北京、石家庄和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在人们想象中，作为民国年代“高干”的蔡元培，在生活上应该是养尊处优、房产众多、家财万贯的“富翁”。但为人正直的蔡元培一生两袖清风，生活简朴，甚至可以用清苦形容。

蔡元培曾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蔡元培这个“一把手”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工作、听取汇报，可是，他兼办《晨报》时亲力亲为，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当时的上海冬日滴水成冰，室内无烤火设备，蔡元培披件蓝色棉大衣，每晚要写两篇论文（一文言，一白话），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馒头一般。但是，他仍坚持工作，右手套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写稿，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在这一年除夕，报社经济窘迫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不得不向同事借一颗蜜蜡朝珠去典当过新年。

当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初，北平街头已经飞驰流线型汽车，可是他却步行上下班。时任财务总长的孙宝琦看不下去，送了一辆马车给他，可当孙宝琦再次登门造访时，发现蔡元培并没有使用马车，原来是没有马，于是又送一匹马。就这样，蔡元培才开始坐在表面斑驳的马车车厢里到北大上下班。

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时，月薪与所有工作人员一样。到北平后，他尽义务兼教育总长，不领分文工资。

蔡元培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艰难。晚年他旅居香港，手头拮据，连生病后也无钱医治。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他身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留给后人的是千余元医药费的欠账。入殓时的衣衾棺木，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

蔡元培逝世时，毛泽东特发电唁：“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22年，刚过20岁的废名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就读，开始写新诗和小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他对胡适、周作人等诸多领军人物非常崇拜，在来北大读书前，废名就给他们写过信。虽然通信多年，但废名与周作人的初次见面却在1923年9月。那时的废名，因其文章已在北大校园小有名气。周作人见到他时，读过他不少作品，尽管其文略带艰涩，但还是器重喜爱这位“面貌奇古”的学生。后来废名被称为周作人的三大弟子之一，成为“京派”作家的代表。

1924年，废名致信周作人，请他给自己自费出版的《竹林的故事》作序，周作人为这位文学青年破例。自此，但凡废名出书，皆由周作人作序，这是周作人本人及当时文坛绝无仅有的。没多久，鲁迅也见了废名。后来鲁迅在谈到废名的创作时，称其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漫画家丰子恺的漫画多以儿童作为题材，大都是叙述他的生活日常，幽默风趣，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活情趣。他的内心也如他的漫画一样，充满童真。

丰子恺在漫画里画得最多的是大女儿阿宝。有一回，阿宝拿了一双软软的新鞋子，并脱下自己脚上的那双给凳子穿上了，还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她母亲连忙说：“别弄脏了袜子！”然后立刻把阿宝抓到藤榻上。而丰子恺却很赞同女儿的调皮。

除了喜欢自己的孩子，丰子恺也很喜欢和邻居家的小孩打交道。邻居家的小孩芳芳和萍萍他都非常喜欢，芳芳刚上小学的那段日子里，她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家里，一个偶然的机会，丰子恺得知她午饭没有着落，便欣然邀请她到家里共进午餐。丰子恺的慈祥、亲切和幽默使这个女孩很快融入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丰子恺带着芳芳和萍萍熟悉日月楼的上上下下，还给她们看他从日本

贾大山的“小径”

包广杰

周边各县城之间，往返数十趟，累得患上了胃肠溃疡。为了重新建造已成危房的常山影剧院，他把铺盖搬到工地，日夜监工，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内。作为一个文化局长，他为正定的文化事业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力量；然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实在是抽不出时间进行小说创作。

1991年，贾大山不再担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后，重新开始写作。“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又引起文学界的小地震和评论界惊呼：当年的“二贾”之一的贾大山，又“杀”了回来！他的小说带给了读者新的惊喜。虽然，当时文学市场不景气，但仍然有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他出书，却被他婉拒了。

贾大山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蔡元培的清贫

郭时民

却步行上下班。时任财务总长的孙宝琦看不下去，送了一辆马车给他，可当孙宝琦再次登门造访时，发现蔡元培并没有使用马车，原来是没有马，于是又送一匹马。就这样，蔡元培才开始坐在表面斑驳的马车车厢里到北大上下班。

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时，月薪与所有工作人员一样。到北平后，他尽义务兼教育总长，不领分文工资。

蔡元培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艰难。晚年他旅居香港，手头拮据，连生病后也无钱医治。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他身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留给后人的是千余元医药费的欠账。入殓时的衣衾棺木，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

蔡元培逝世时，毛泽东特发电唁：“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废名的狷介

沈治鹏

文“冲淡中有哀怨”，不大“闪露”，这是褒；说其小说“直率”“顾影自怜”，这是贬，评价中肯。

在周氏兄弟办的《语丝》杂志上，常发表废名的作品。1926年6月，废名的日记里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足见废名是很懂得鲁迅的。

废名从北大毕业后，曾以写作为生，苦苦度日，实在难以继，便找到胡适。胡适为废名作了一个任职资格证明，加上周作人极力帮助，才在1931年底被北大接受为教师。废名初登讲台，第一课便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历来快人快语，从不收敛锋芒。他将讲义往讲桌上一放，劈头说道：“谈到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此语一出，讲堂肃静，学生愕然。

丰子恺的童真

李云贵

带回来的各种漫画书和画集。工作之余，丰子恺经常会从口袋里掏出小木子，生动地描写出姐妹俩阿宝讲故事时的聚精会神、初学打毛线时的笨拙滑稽、逗阿咪（家猫）玩耍时的笑逐颜开以及妹妹坐在痰盂上梳头扎辫子的天真可爱的画面。

有一次，阿宝带着外甥、外甥女、芳芳和萍萍一同出去春游，她们回到日月楼后，兴奋得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丰子恺闻声从楼上的工作室下来了，听孩子们七嘴八舌的描述。此时，阿宝开始教唱《送别》，不料唱到一半被丰子恺制止了，他对女儿说：“小孩子哪懂什么知交半零落啊，我给他们另外写一个！”一时兴起的丰子恺沉思片刻后，张口就哼唱起新版《送别》来：“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这首充满童趣的歌让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首词，后来还配上朗朗上口、优美动听的乐曲，丰家老小百唱不厌。